

- 時間：2022年10月19日
- 地點：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203室 ( 臺灣大學 )
- 受訪者：陳貴賢
- 採訪人：吳國禎、鄭慈瑤
- 逐字稿審定：陳貴賢

( 訪談開始 )

### 政治啟蒙的契機

陳貴賢：我是陳貴賢，南投國姓鄉人，我讀的學校叫北山國中。在北邊山上的國中，我從小學一年級到國中畢業，九年的時間，每天要走兩小時的路，一小時上學，一小時放學，不是平地，是山路，所以我們讀書的經驗比較艱難。後來，國中畢業以後去讀台中一中，接著去讀臺大（國立臺灣大學），當兵完出國。我事實上對於台灣歷史的認識，很晚才開始。回想起來，比如說二二八事件，我是一直到大學畢業那天，我才聽到：「喔！原來台灣有二二八這個事件」，所以在早期來說，因為連二二八.....你不要說台灣獨立，連二二八都是一個禁忌，你如果在外面跟人說太多，被報上去，那會被抓去找麻煩的。所以大學畢業之後、當兵、出國，當初去波士頓讀哈佛，在波士頓，外國的資料，可以比較自由的取得，在台灣你根本無法取得，除非你有特別認識的人跟管道，到美國之後，那些過去的雜誌、報紙，圖書館的東西，都可以閱讀，才開始了解：我們以前學的台灣歷史，我們自己的歷史，跟事實有很大的差別，所以那時才慢慢開始，人家說「覺醒」，因為那個「覺醒」，在哈佛的台灣學生之中，也是各種都有，我那時開始覺得，我們需要組一個「台灣同學會」，我們台灣的學生自己組一個同學會，在哈佛，那原因是，我們要去留學的時候，哈佛說：「你們從外國來，如果來這裡出問題、沒有錢，要怎麼辦？不行，我給你獎學金沒錯，但是你要先在波士頓銀行開一個帳號，這個帳號錢放進來，你來美國之後，不會突然間沒有錢生活。」你可以想像一個外國人，又只有大學畢業，要遙控去波士頓開一個銀行帳號，放一千塊美金進去，這

是很困難的事情，當然我現在是千辛萬苦都解決了。所以後來的學生，大家就覺得，我們創一個同學會，將來台灣的學生要來，可以來問我們，我們把SOP寫一寫，甚至我們可以在美國這邊替他們跑銀行。類似這種事情，所以大家就成立一個同學會，成立的那天（大家）就說，我們要取什麼名字？有人說中華民國、有人說台灣，就投票，投出來是中華民國，我很厭煩，我就離開了。我搞得要死，又回去中華民國，可是，要選會長的時候，中華民國派的派出一個，叫做陳勁.....（陳勁甫），什麼名字我忘記了，他是維吉尼亞軍校畢業，台灣孩子，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第一名畢業，不簡單喔，陳勁甫，杜甫的甫，結果呢？他在維吉尼亞軍校第一名畢業，哇，回來（台灣）之後，軍方啦、郝柏村啦，就把他弄得（場面）很大，說這是我們的台灣之光，我們台灣人看到，去查（發現），他就一個小留學生，根本在台灣連兵役都沒有服，那時的黨外，民進黨，就開始攻擊，郝柏村就演了一場戲，說因為他愛國所以派他去哈佛留學，不用當兵，其實他早就拿到哈佛的入學資格，就把情況轉圜過去，所以在同學會成立的時候要選會長，陳勁甫就出來競選，只有一個人選，我們有一個（人）不爽就說：「為什麼我們選一個會長，要選一個作奸犯科的人，一個逃兵、小留學生？」講出來後大家就很不愉快，吵起來，投票的時候大家想說，你這個人有爭議嘛，人家對方又推一個，另外一個我們電機的人出來，推一位呂育道，（臺大）電機的教授，呂育道當選，所以第一任「中華民國同學會」，會長呂育道。過一年之後我當選，我當會長，我很積極地在短期間內，改成「台灣研究社」，所以哈佛的「台灣研究社」是我本人擔任第一任的社長，在哈佛那段（經歷），包括我們有那麼多的機會，可以讀到各國（歷史），台灣的歷史、中華民國的歷史，閱讀之後，我們發覺，事實上我們應該要認同我們是台灣人，在那個過程中，我擔任會長任內，一個月至少辦一場活動，都跟台灣文化和台灣歷史有關，尤其是那些從台灣出來的人，譬如高雄事件之後，第一個出來的是呂秀蓮，她也是我們哈佛的學姊，她到的時候，我們就辦一個活動，很盛大，後來包括黃華、施明德。因為波士頓是一個文化重點，所以都去波士頓，我們一個月至少一場，對於台灣的認同，對台灣的參與，我自己是在美國的時候開始。一直到後來我畢業，做了差不多三年的工作，才回到台灣，回到台灣就直接

到中央研究院的原子分子研究所（服務），這個所是當初李遠哲，我們台灣諾貝爾獎的得主設立的，我回來這個所，一直服務到今日。差不多是這樣的過程，參與地下電台TNT的工作，差不多是1994年左右，我回來是1993年，過了一年，就開始想方設法，看能不能做些什麼，經過一年的時間，就開始成立TNT。

### 見證台灣民主化歷程與設立TNT寶島新聲廣播電台

陳貴賢：美國可能有一些地下電台的歷史，在全世界都有，對於這個在體制之外的發聲，這是我們說的地下電台，但是實際上我並沒有參與，當時我回來（台灣），實際上我們知道台灣整個民主化的過程，最早是被黨政軍特完全控制住了，後來戒嚴解除，這是很大很大的一個階段，戒嚴解除之後，我們以為比較自由了，沒想到，還有《刑法》100條跟101條，除了戒嚴，還有一個戡亂時期（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》），那也是一個階段，也拿掉了；但是後來最大關鍵點是，（《刑法》）100條跟101條，任何人如果反對政府，就把你當成叛亂，那是唯一死刑，如果是思想，你有些想法要做，或是跟別人談，雖然你沒有行動，這樣是101條無期徒刑，這是很嚴重的，那時候就是因為史明先生的獨台會事件，起來之後，就是野百合嘛，因為野百合運動，所以《刑法》100條跟101條也修改，修改之後，我們覺得台灣確實很民主了，很公平、自由了，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，雖然你把法律的制度拿掉，但是所有的，這些電台、這些媒體，整個都被黨政軍所控制，所以中視是黨、華視是軍、台視是政，是黨政軍這樣掌握住，尤其那時的報紙，三、四份報紙，甚至每一份報紙幾張，張數都受到限制，台灣民主發展至今，大家一直想要打破，當時的一個階段，大家發覺，報紙需要很大的財力，如果要成立一家報社，沒有幾千萬的資本，可能只能創造一個地方小報，沒有什麼意義，後來我們發覺廣播電台，可以是很小的資本，過去如果任何人違法廣播，馬上就被抓去綠島，所以開始有人做地下的廣播電台。那時我們接觸到的第一位就是張俊宏，他的「全民廣播電台」，張俊宏是立法委員，他知道有這個機會，他就叫他的一位堂兄弟張襄玉，張襄玉就是很有名的矢板明夫他太太的

父親，張襄玉的一個女兒嫁給矢板明夫，張襄玉在搞這個全民廣播電台，設在大安森林公園旁邊，那時我和楊英杰，臺大電機的教授，都剛從美國回來，我們就開始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做的方向，因為我們都是電機背景，相對而言，對那些工程、機器，我們學一下就會了，所以第一步就是先去參與全民廣播電台，那時我們創建了《街頭巷尾》節目，一個小組，每天一小時的節目，大家分工，一人一個禮拜，負責一次還兩次，也有做一些廣播劇等等，從那時開始練習，慢慢了解電台節目要怎麼做，做不到半年，我們就覺得可以了，我們自己也來做，那時就組了一個「寶島新聲廣播電台」，那個名字後來取做「TNT」，Taiwan New Telecommunication，反正有一個T跟N跟T，因為TNT好記多了，事實上也證明，現在大家比較記得「TNT」，比較不會記「寶島新聲廣播電台」，那個名字當初是呂桔誠（想的），就是我們這些不爽國民黨的，大家互相熟識，呂桔誠後來當過台銀董事長，他想出來的這個名字，他取這個名字確實很好。TNT成立的時候，當然需要資金，我們大部分都是有心的人，尤其我們在學術界，雖然大家都沒有什麼經驗，找來找去，找了兩個比較大的（政治人物），一個就是尤清，當時台北縣的縣長，另外一個是找阿扁（陳水扁），當時是透過羅文嘉，所以兩個算是政治方面的人物，幫忙出一部分的資金，還有一些比較有心的，譬如鄒武鑑，他是一個滿特殊的人，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，他回來之後也是一直忙東忙西，對於國民黨很不滿意，他自己有一次設了一個發射機，也在試做廣播這件事，他一操作下去，可能沒有半天就被人抓走，在那個時期來說，可能蔣經國還在的時代，還很嚴。因為廣播這件事情很簡單，你收到一個訊號，知道從哪裡來，另外一個點又收到一個訊號，這兩條線合併起來，發射點就出來了，所以他馬上就被抓去關，也關滿久。後來鄒武鑑出來（出獄），他太太叫做蘇惠珍，蘇惠珍也是民主運動很重要的人，鄒武鑑知道（我們）年輕人在搞這個，他也投入金援，我們必須要感謝他。所以就這樣，就做起來了。

## 參與全民廣播電台的《街頭巷尾》節目

鄭慈瑤：請教教授，剛才您提到「街頭巷尾小組」，我有點好奇在「全民電台」裡，是做什麼樣的節目？

陳貴賢：《街頭巷尾》那時候等於是，那個人叫做林德宗，現在他在波士頓工作，他也是一個偏工程方面的人，德宗、張昭仁、我、蔡丁貴、楊英杰，林文印、許文輔也有，反正就是四、五個人，那時候的節目還是比較政論性，也可以談文化，也可以談環保，但是就是以我們這些留學生為主。我們有一陣子曾在全民廣播電台做類似邱罔舍這樣的廣播劇，帶子也有留下來，但不是那麼簡單，一個廣播劇裡面，如果有五個人，你如果找五個人來錄音，配合得不好，真的廣播劇的人都一兩個而已，一個人說三種聲音，這樣配合才簡單，我們那時候當然沒有，很辛苦，錄一些廣播劇，「街頭巷尾小組」那時候做的大部分是政論性，包含這樣的節目。

## 九〇年代協助架設地下電台的經驗

吳國禎：在那個時代，其實從TNT要分出去「寶島客家電台」，還有講過「臺灣大眾廣播電台」，他們好像很自然就會請您幫忙發聲的部分對嗎？

陳貴賢：我想這基本上就是說，我們臺派人士，圈子也沒有很大，當然TNT開始設立，我們都沒有計較，不是在賺錢，所以成本也比較低一點。這裡面有趣的是，現代一般的觀眾或聽眾如果想弄一個廣播，隨便網路上弄一下，一個頻道就出來了，我自己也可以做網紅。

吳國禎：現在是這樣。

陳貴賢：現在是這樣，那個時候並不是這樣。那時候的《廣電法》，你如果沒有經過政府的核准，你弄這個是違法的，他就能依法把你抓起來判刑。不過因為在那個階段處在轉型的過程中，一般人民了解這個法是惡法，是不合理的法，那時候也因為是李登輝的時代，所以李登輝希望台灣可以慢慢（改變），所

以他也不會執行得那麼徹底，我那個時代新聞局長叫做胡志強，所以他還是要執行。有時候國民黨的立委也得要質詢他，教訓他：「你為什麼都沒在抓」，甚至交通部長也教訓，所以不得不執行，執行可大可小，所以這就和我前面說的鄒武鑑時代不一樣，一抓到就送你去綠島，已經在轉型的過程，那時候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，就是說不清楚，你到底會多嚴格或是有多嚴重，所以大家慢慢的一步一步走，後來，就像我說的一般的民眾、社會覺得廣播本來就是言論自由，哪有什麼不好，所以壓倒性，連新聞局和交通部也不敢太嚴格，最多就是被逼到不得已的時候，出來抄一下台。抄台就是，我來到你們這裡，把你們的東西收起來做證據，抄你們，但是沒有抓人，所以對我們來說是財物損失，這就比較簡單，如果是人被抓走就比較麻煩，所以在那個時候，慢慢的有生存空間，但是那時候所有的發射器材還是管制品，你不能自由買賣，如果要買一定要政府核准才可以進口。在剛開始的時候自己弄一台小機器還可以，但你真的要發射給比較多人聽，你還是要買功率比較大的，設置比較好的，對我們來說那時候還沒有網路，不過已經有電子郵件，就是想辦法連絡外國的一間義大利的公司，在美國又有分公司，因為比較常去美國，就去美國向他買，這就是「走私」，自己偷帶進來。後來就慢慢把一些貨訂在聖地牙哥一位同鄉那裡，需要什麼貨就買到那裡放，我們可能一年跑一趟，那時候就是靠台灣同鄉幫我帶回來，陸陸續續帶回來，才能把發射的功能買來這樣弄，這當然很有趣，包括我好幾個朋友，中央研究院有一位副主任有一天遇到我，他跟我說：「你就是陳貴賢？」我說是，他對我說：「我帶過你的機器」，他本來也不知道我是誰，就同鄉會拜託他帶回來交給誰，好幾位台灣同鄉，大家都了解，為了台灣的言論自由來幫忙，一步一步好像螞蟻在搬食物一樣把設備裝起來。更有趣的是，機器我們本來從差不多兩百瓦左右，小小台不夠，弄五百（瓦），五百（瓦）就相當大台，甚至一千瓦的機器，剛好我們出國最大只的旅行袋大小。我平常出國絕對拖一兩只回來，有一次我剛好拖兩只，坐在飛機上要回來台灣，看到電視在報李總統這天剛好要回國，機場一定戒備森嚴，回國的時候，當然機場都很緊張，這要怎麼辦才好，帶這個絕對完蛋，想不到我一入境的時候，李登輝總統已經進去了，所有海關的人都放輕鬆，（我就）大搖大擺完成任務。也有一次，我們就用報關的，沒人像我們那麼不怕死用報關的，回來還卡在海關，我很急，我記得那次剛好是蘇貞昌要連任屏東縣縣長，那時候我已經設計好，機器進來要下去屏東設地下電台，替蘇貞昌助選，卡在海關，幸好拜託阿扁的助理羅文嘉打一通電話，馬上就拿出來，漏夜送到屏東設地下電

台，像這種經驗都有，你說設地下電台，被抓去關嗎？再來就是機器，是不是合法可以進口，還是你要用什麼方法載過來？這都是相當有趣的故事。

## TNT電台節目觀點多元

陳貴賢：電台比較突出的就是，我們做這個節目，每一個人的專長都不同，每一個人的力量也有限，你如果說那時有一個叫做，許榮棋，我忘記他那個電台叫什麼名字.....

鄭慈瑤：台灣之聲

陳貴賢：台灣之聲，那也比我們（TNT）還要出名，差不多是一個人的電台，當然那邊有安插一些人，但他一個人佔大部分這樣，我們自己大部分參與的人都跟我一樣，有一個正務要做，所以下班時間才來幫忙。TNT一開始的時候邀請各界人士主持節目，容納各種本土派的言論，這也是一個好處，好處就是節目很多元，不會只有一個人的觀點。我覺得它的特色很不錯。比如說，我現在做到一個階段的時候，我自己就覺得，為什麼節目裡都沒有客語，因為我是客家人，甚至因為我住南投，每個星期台北與南投跑來跑去，開車的時候，都沒聽到客語的廣播，很失望。所以就在TNT的黃金時段開一個客語時間，好像是八點到九點，還是九點到十點，一個帶狀的客語時間，客語時間也是每天都不一樣的主持人，每人一星期做一小時節目。當初，比如說傅雲欽傅律師也在裡面，所以TNT的廣播電台是第一個提供帶狀的客語時間，這就很有它的特色。不僅如此，因為這個帶狀節目一出來以後感動了台北地區的客家聽眾，因為不曾在電視，或是在廣播，聽得到自己的母語，所以吸引很多聽眾進來，隨後就有人建議，一天只有一小時怎麼夠，就順勢成立「寶島客家電台」。「寶島客家電台」一開始是和TNT在同一個空間，錄音室也是共用，只是多掛一個牌，大家輪流用。發射機當然要分，各一套發射機及兩根天線在同一棟樓，就生一個友台出來，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。那時候客家的電台開始的時候，本來都是政府控制所有廣播頻道，後來有我們

自己的聲音，甚至提供原住民一個帶狀的節目時段，每天給不同的族群一個發聲的機會，我覺得那是台灣一個重要的歷史。

吳國禎：我記得那時候，寶島新聲TNT是95.1，客家電台好像是93？

陳貴賢：93.7

### 談TNT寶島新聲廣播電台共事夥伴

吳國禎：教授您能不能想一想，那個時候你印象比較深的伙伴，共事當中，開始有一些比您年輕的人參與，像是TNT與您接觸過的歷任台長，還是您印象比較深的行政人員，或是主持人，後來「寶島客家電台」也是，就您覺得印象比較深的，可以提一提這些參與比較深的對象。

陳貴賢：最開始當然就是我和台大電機系的楊英杰教授，再來成立的過程中，有一位張昭仁，那時候也做過台長，張昭仁之前，有一個林美娜也做過台長，我和楊英杰都在學校都有職務，不能公開掛名，那時候搞來搞去，就找到林美娜。林美娜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，他也把TNT的名聲弄起來，幫助很大，後來有一個困難，那時候發生一件事情，他可能有一些募款，他用TNT的名義出去募，但是沒有放進TNT的帳，放到另外一個單位還是怎麼樣，結果大家就撕破臉，撕破臉以後，就請張昭仁擔任台長。張昭仁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人，他本來連主持都不敢，但是被趕鴨子上架之後，就覺得拿麥克風很不錯，就忘了自己是誰，我們那時候叫做「麥克風症候群」，他（張昭仁）居然和一些支持者，私底下說要創立一份報紙，本來支持者都是TNT的，他也沒有跟大家討論，他創立了報社我們才知道，我們只好和他分手，那是另外一個插曲。我自己後來慢慢因為「寶島客家電台」的關係，我把比較多的重心移到「寶島客家電台」，所以TNT的部分，事實上是楊英杰處理得比較多，當然這件事情他也是處理相當長的時間。

吳國禎：教授我們剛才在說器材的部分，我有印象後來你們引進器材，我們這幾台好像有請台灣的技術的員負責維修。



陳貴賢：是，我那時候有一個叫做李堅欽。他現在也還是在從事這方面（的工作），他本來是在外商，在飛利浦公司。他一聽到TNT就辭掉來參與，包括服務客家、TNT、大眾。桃園有一個「新客家」，花蓮有一個「希望之聲」，再來台中有一個「望春風」，「望春風」現在還在，合法了，有他幫忙，對我們幫助非常大。

吳國禎：教授您後來在「寶島新聲」，還是在「寶島客家電台」，印象比較深的、參與比較多的成員大概還有哪些？

陳貴賢：「寶島新聲」比較資深的，那時候張國龍教授他太太徐慎恕。還有一個阿枝，徐慎恕跟阿枝他們是很好的朋友，他們這一輩我比較記得，那時候比較有往來，再更年輕一輩，現在在台北大學，林文印、許文輔，那時候做台語，包括歌仔戲，雪香、建盛、滷卵，我一時之間比較記得的。

吳國禎：雪香是台大法律系對嗎？

陳貴賢：對，我記得那時候，有一次，TNT成立沒多久，有一次辦一場訓練營，我現在忘記了，那時候營隊怎麼會那麼厲害，我們從台北下去，在哪裡呢，去張清溪教授他家，他跑去南投，但是我們從北山國中進去，一個澗仔溪的地方，其實很偏僻的地方，去那裡辦一個訓練營，那個地方就是後來九二一大地震，幾乎距離震央（九份二山）很近，難以想像那時候跑到那裡辦，我現在忘記了，那時候如果跑到那裡，也是我的關係，我那時候認識張清溪，可能是不知道哪一次，我曾說你們那裡空間那麼大，就安排在那裡，我們這些年輕人打地鋪睡覺，在那裡辦一個廣播營。

### TNT寶島新聲廣播電台台址及抄台事件

吳國禎：教授我記得那時候，客家電台和TNT都在羅斯福路二段，好像都在同一棟大樓，我記得有這件事情？

陳貴賢：我記得在東帝士大樓。

吳國禎：那是怎麼找的？

陳貴賢：我們那時候要找一棟高樓，本來楊英杰都在台大附近找，就覺得那間不錯，我們本來是租一層中的一戶，後來客家電台也愈做愈大，就把隔壁戶租下來，變成兩戶連在一起，大家也互相照顧。我記得一件有趣的事，有一天我們被人抄台，那時候兩台都一起被抄台，我們本來就希望發生，那時候晚上，很晚抄台，他們來抄的時候，張昭仁是我們的台長，他把自己鎖在辦公室不出來，結果其他工作人員來應付，那時候就是慧真，他也是客家台的，當然他（抄台者）要來抄我，我也不能客氣，至少要和你對罵，罵完，最後都要結束了，那些警察才打開台長那間，張昭仁才出來，事後大家就有點納悶：「你身為台長，你躲在裡面，事情結束了才出來」，張昭仁他解釋說：「我就是要躲在裡面，要讓他們破門，門打破那種暴力的」那是他的說法，我想張昭仁還是膽量比較小，結果是那些小朋友、女性工作人員在應付這樣。抄完第二天辦記者招待會要和記者說，來很多媒體，和大家報告說九點，早上九點，我們一去，門鎖著大家都進不去，發生什麼事情？台長張昭仁的鑰匙忘記帶，如果要回去拿，回來要再一小時，大家又擠在樓梯，那時候是我從隔壁間客家台這邊，經過外面，爬到那邊才開門，我印象很深，從外面進去，過去對面以後，落地窗還鎖著，一直弄、一直弄到讓它（門鎖）自己掉下去才打開，我還記得那時候很多人，林山田、傅律師（傅雲欽）大家都在外面等不能進來，還好最後還是順利把記者招呼來，讓大家知道那時候TNT和客家台都被抄。

吳國禎：過沒多久好像是外獨會（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），用一個「TNT華語台」？

陳貴賢：對

吳國禎：好像有一段期間，你也有幫忙對嗎？

陳貴賢：有，稍微，技術上，一些設備，坦白說那不是我創立的，但是幫忙支援，那時候有田欣、廖中山他們。

吳國禎：TNT是開枝散葉，「寶島客家電台」，再來「TNT華語台」，一開始看到想說為什麼有華語台，剛好你有提，我也有聽，才知道他們主要用華語說，強調用華語說理念。

### TNT寶島新聲廣播電台與臺灣教授協會

鄭慈瑤：再來就是我想要請教教授台教會（臺灣教授協會）和TNT的關係。

陳貴賢：那時候當然很多台教會的成員，包括我自己也是台教會的會員，我們都會利用這個人力資源來邀請，比如說一星期七天，以前沒做到二十四小時，以前都做十八小時，中間一個重播，所以節目時段很多，我們也有請很多台教會的人員來參與。

鄭慈瑤：這些台教會的人員，主要也算是TNT的核心人物嗎？

陳貴賢：我和楊英杰本身也是台教會，但是我們做這件事情並沒有和台教會報備，也沒得到他們的資源，但是就是變友軍這樣。記得戴寶村、林三田、李泳泉都是常客。

吳國禎：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有一個，我現在沒有辦法講清楚，好像類似教授論壇之類的？

陳貴賢：對，有一個教授論壇。

吳國禎：每天都有不同的教授來講，那很好聽。

陳貴賢：所以就比較多元，比較豐富。

### 參與TNT寶島新聲廣播電台決策小組之工作

鄭慈瑤：那老師您當年是TNT的決策小組嗎？

陳貴賢：當然是，我和楊英杰設立的

鄭慈瑤：我很好奇決策小組實際上在運作的工作是哪部分？

陳貴賢：重要的事情決策小組決定的，陳水扁、尤清那邊各有一個，我和楊英杰、還有鄒武鑑，就五、六個人而已。

吳國禎：主要就是人員的編制，比如說台長之類的，這些事情可能會討論嗎？

陳貴賢：那絕對是要討論的，包括整個人數，開始節目不夠，當然你就盡量聘人，開始節目強碰，大家要搶的時候，決策小組就得出來裁決。

吳國禎：教授，您個人後來重心比較放在客家電台，這個決策小組，它慢慢到什麼時候，被別的組織取代？或是您慢慢淡出的情形？

陳貴賢：我後來就直接和決策小組說，時間的關係，我退出來，後來當然就是像我說的，楊英杰他們繼續運作，有沒有再找新的人進來我不知道，後來就是素華，素華進來做一陣子，怎麼樣的情形下轉到大千，這部分我只知道某一個時候，他來拜託我授權，把所有權利放棄給他們這樣。

### 地下電台的「都市游擊戰」策略

陳貴賢：我們回來說更早的故事，你如果只是發聲，支持者來，事實上也不夠，你知道很多媒體都要廣告，要有廠商來，那才是比較大的收入，雖然我們主持人大家都義務，不過弄一個地下電台，就需要柴米油鹽醬醋茶，電費、水費、打電話，雜七雜八搞起來，一個月也要好幾十萬，包括辦公場所的租金等等，所以經濟財務要維持，也不是那麼簡單，幸好那時候新聞局不得不抄台，我們現在就能了解，我故意讓你抄，因為你一抄台，媒體都出來廣播，所有媒體電視台、報紙，全都報，免費幫我們打知名度。很多支持者包括計程車司機，他們看到警備車，不管是保三還是保一總隊，出來都兩三台巴士一起，他們如果要來抄台，一到可能就一、二十個鎮暴警察下來，全都封鎖，才上來抄你，所以他們一出現，我們都知道，因為他們都住在郊區，從林口出來，不到十分鐘，就有計程車司機（回報）：「我在這裡看到鎮暴車

往哪裡開」，我們就差不到知道，一路報回來，就知道說，確實要抄台，我們就故意繼續廣播，罵得難聽一點，那是一種「釣魚」戰術，故意一直廣播，直到離我們約五分鐘（車程）而已，才停下來，快點把重要的機器拔一拔，拿去地下室的車上，開走，他來當然會抄，錄音機、麥克風等隨時都能買到的器材，所以損失不會太大，我覺得那種經驗就是說，我是故意要讓你抄的，那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。另外一個經驗是我們發覺，我們實際是一個「都市游擊戰」，都市裡面大家都在生活，你也有租同一棟大樓，我們過去做電台，放在二三十層的大樓上，當然你看得到天線在那裡，所以他（抄台者）也知道說就在這棟，他也知道說哪一樓哪一間，因為我們的來賓、主持人進進出出，他絕對知道，這沒辦法防，但是沒關係，你來，我就讓你抄，你來的時候，要到的時候，我回去把天線拔下來，發射機最困難，發射機是違禁品又很難帶，但是我們不只是帶到車上拿走；我的電台放在幾樓，我的天線放在屋頂，但是我機器放在中央（其中）一樓的一間房間，你根本不知道，你不可能把整棟大樓每一層都抄，就是形式上說我被抄台，但發射設備沒有損失。這種「都市游擊戰」是很特別的經驗。

鄭慈瑤：有一件好奇的事，因為教授講「都市游擊戰」很精彩，我想問常常這樣演，而得到資金，但是民眾會不會疲乏？

陳貴賢：這當然也不是說一直這樣演，久久一次。再來就是說，聽眾對你的支持好幾種，一開始是你敢挑戰國民黨，大家就支持你，再來就是，像你說的抄台，大家本來沒在聽，但是你被抄台，我支持你，最後還是要靠你，你的聽眾長期來，包括你的理念，你的節目做得很好，支持你，雖然我們沒賣藥，但是我舉一個例子，我那個時候負責客家電台，客家電台到後來，因為要做到所有節目主持人我都發主持費給他，雖然說不多，但是我要和你簽一個約，我要發車馬費給你，我要約束你，你不能隨便出差錯，所以客家電台到後來，我那時候要成立的時候，一個月差不多要將近一百萬的開銷，那時我最大的目的是，我要做到能夠打平，開銷一百萬，但是我的收益，捐款部分差不多七八十萬，我的意思是說，我如果有一天可以做到打平，我就能長久（經營），那時候也有開始做一些廣告，你就能知道費用到什麼程度，甚至今天來說，你要創立一個，一個月一百萬的公司也不簡單。政府新承認頻道執照，還有像我說的，一間公司，尤其是廣播電台，要生存沒那麼簡單，地下化的時候，大家還會同情你，會捐款給你，合法了，就得自己好好經營、發揮了，

反而人家不見得會捐款給你，所以困難我是可想而知。

### 談廣播、播客與電視製作之別

陳貴賢：其實廣播本來就比較小眾，和目前我們說的「播客」一樣，我只要找一群小眾，對我們的理念或是說題目有趣，就能夠找到支持者。其實它是一個很低成本的媒體。相較之下，你如果要弄一個電視，你要考慮攝影棚、化妝、燈光一堆，到頭來自己要說的主題卻被忽略了。但是廣播電台，相較CP值高很多，所以是一個很好的媒體，包括今天說的「播客」也一樣，因為現在網路的關係，空間無限大，你要開幾台就開幾台，看你的本事。就是你能說得多吸引人，所以這不一樣。

### 談地下電台合法化之後的發展

吳國禎：可是剛剛一開始我們也在說，有時候我們那個時代，打拚的，你們的時代打拚拓展出來的空間，往往在後面，就是我們現在的客家的頻道，其實跟那時候努力開展出來的空間，那個質真的有落差，包含台語的節目，我很坦白說，有很多民主電台，它後來合法化以後，很快就賣給有財力的人，像這些現象教授您會覺得可惜？還是會感慨？

陳貴賢：當然確實有這個問題，我自己有時候想說，當初搞得拚成這樣，也是設立很多台，後來也都合法化，雖然說商業化那部分我覺得還好，最後就是要面對，要怎麼生存、怎麼經營下去，臺灣聯播網還是綠色和平聯播網等等，我想都還好，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，有一些失望是，比如客家電台，後來有「海峽聯播網」節目，海峽聯播網意思就是說兩岸兩邊在聯播，一聽就知道，這個客語是大陸客，腔和我們都不一樣，這樣也跑來我們這裡，不只這樣，做到在福建、在廣東做，直接向台灣廣播，我想我們當初地下電台、民主電台，我們目的就是要為了台灣的民主和台灣的將來，你今天給我引導到讓中國來台灣直播，所以我那時候是非常憤怒。

## 為理想投入地下電台兼顧專業工作

吳國禎：我請教教授，那個時候大家都在用地下電台，但是有各自想要追求的理想，或者說，各自想要追求的一個重點，各自有些差異，那教授您那個時候回來臺灣，您覺得最主要投入很多又很深，很少人像您這樣，幫助很多台做節目，器材軟硬體都有參與，這麼多地下電台這樣一直做下去，跟您的專業工作，會不會佔去很多時間？

陳貴賢：如果沒有用到時間，那是騙人的，那絕對要分心，當然我自己給自己一個很重要的看法，就是說絕對要把本業顧好，你如果本業顧不好，除非說要做專職的革命家，像許信良這樣，不然的話你就是顧好自己，可以出多少力，就出多少力。我想在經驗上，我最大的一個心得就是說，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，人生的過程當中，可以做些什麼，讓你證明，你自己是有用的，我做一個有意義的事情，當然你說多重大，我們不知道，但是我們無論如何都希望，我們知道有一個理想在那裡，就是「台灣」，我要做一個對台灣有幫助的、有意義的事情，這個事情在早期，就像史明、鄒武鑑，做了就被人抓去關，那時候是，但是到後來，在慢慢民主化的過程中，發覺我有比較多空間可以做，每一個人自己努力去找，做什麼最開心，如果說我就賺錢，賺很多錢來捐給台灣社會也很好，但是如果不是這樣，在這個過程當中，地下電台的時期，還是說過去更早，野百合的時期，還是更早，解除黨禁、戒嚴等等，都是很有意義的事情，所以每一個人在每一個階段，都在找一個讓我們證明自己是有用的，這是我自己在所有參與裡的心得。

( 訪談結束 )